

如今，当你漫步在风景优美的湘江之畔，你会看见一块重达百吨的巨石，这块 120 吨的青灰色花岗岩是从 4000 多公里之外的天山峡谷运来，以纪念八千湘女上天山，保卫、开发、建设新疆的丰功伟绩。

72 年前，共和国历史上首批大规模进疆的湖南女兵奔赴天山南北。据统计，从 1950 年到 1952 年 3 年间，湖南共计有八千余名女青年应征入伍。她们进疆的漫漫西行路，迎着肆虐的风雪，冲破残匪的袭扰，也开始了自己不一样的工作和人生……

正是她们的付出，结束了“屯垦戍边，一代而终”的历史，让新疆，让祖国的千里边防长治久安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 70 余年过去了，岁月早已经将出发时风华正茂的少女，变成了回来时饱经风霜的奶奶，她们的芳华，在新疆绽放。不变的是她们为祖国奉献终身、改变边疆面貌的初心，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、勇于担当的意志品质、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，永放光芒。

湘水边的那块“湘女石”与天山遥遥相望。天山下，湘水边，亲情从此绵延牵挂。

新疆，留下的是我永不枯竭的青春

口述 / 刘布诚 文 / 方雪梅

湘女档案



湘女刘布诚，1933 年出生，1950 年 2 月进疆，曾在南疆军区第十二医院传染科工作，1970 年转业回到长沙。目前居于长沙。

1950 年秋天，岳麓山的枫叶红了。这一年，我刚满 17 岁，在长沙湘雅护理学校读书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急切地希望投身于建设新天地的时代洪流。

到边疆去

时令正是 9 月，一个消息，让我们班几个正在湘雅医院实习的女同学兴奋不已——报纸上刊发了新疆军区技术人员招聘团到长沙招人的新闻。我和闺蜜罗蕴华等五个女生，兴高采烈跑到营盘街去报了名，且很快被批准入疆。

听说我要到千山万水外的地方去，外祖父十分不舍。是啊，他唯一的女儿生病去世时，把 5 岁的我和 3 岁的妹妹托付给他，从此我们在外祖父的膝下长大。而父亲对我的决定十分生气，他希望我留在长沙工作，帮衬家里。但参军、奔赴边疆去建设国家，就是我最坚定的选择。

9 月中旬的一天，我与同学们一起，告别长沙，坐上了西行的绿皮火车，向着未知的远方进发。火车到达西安，稍事休整后，我们 20 多个“湖南娃”，和行李

一起，挤在一辆老旧的敞篷大卡车中，沿着险峻的土路翻山越岭，颠簸着驶向兰州。我两手抓着车篷栏杆，双脚悬在车外，任耳畔山风呜呜，脚下深渊百丈，毫不畏惧。由于交通条件差，进疆的汽车陈旧，车队沿途抛锚和出现车祸的状况时有发生；加上西北土匪残部出没，有的人还没有踏上新疆的土地，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……

到达兰州后，部队的军服发下来了。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色军装，姑娘们兴奋得又叫又唱，歌声不绝，洒了一路。过了兰州，进疆之路，越来越荒凉。当汽车进入新疆地界时，巍然竖立的一块大石碑出现在眼前，上面刻着醒目的大字：“有志青年到边疆去！”大家顿时一阵雀跃。这意味着，新疆到了！

“我们不是镶牙的”

乌鲁木齐街景，萧条而贫穷，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，更没有火车、公交车。严寒和少雨，是气候常态。看到一穷二白的城市，我感到肩上担负的建设新疆的责任，是沉甸甸的。就这样，在天山脚下，我们开始了人生与事业上的另一次长征。

几天后，五个女同学都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一医院。医院旧而破，只有几排土坯泥巴房，药品也十分紧缺。

报到的第一天，听说我们会被安排去口腔科，大家十分诧异。院长问：“你们不是镶牙的吗？”姑娘们面面相觑，不知就里。原来，头一天，招聘团的一个同志，兴致勃勃地给院长介绍：“我给你们从长沙找来的，都是镶牙的……”我们一听，乐了：“我们是湘雅的，不是镶牙的！”大家笑成一团。

我分配在内科，内科以肺结核病人居多，重症病人死亡率较高，有时一晚上死几个。肺结核有传染性，医院又没有有效的隔离设备，医护人员靠着年轻、体质好，超负荷地完成工作，谁也

没有退缩。

我们工作起来，没有星期天和休息日，个个争先恐后，干劲冲天。新疆当时的农业很落后，工业基本从零开始。大家的军装，缝缝补补，直到穿得破破烂烂，也不舍得换。有一次我的宿舍失火，烧坏了盖在被子上的棉衣，所幸人没有烧伤，但院里给我补发了一件新棉衣，穿在身上，我感觉自己搞了特殊化，心里忐忑不安。

气候苦寒和饮食不习惯，对我们这些南方人，也是一种考验。每到冬天，我们不少人的耳朵、手脚就长满冻疮；在吃的方面，常常是高粱包谷换着来。南方人对白面尚不习惯，对杂粮就更难咽下了。但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劳动任务，我和几位女同学，会逼着自己填饱肚子。因气候干燥，我经常扁桃体发炎，喉咙疼得像要冒烟，粗粮咽不下，就喝点面糊糊。

在艰苦的岁月，我们都努力让自己适应环境，锻炼坚强的意志。

爱情来了

花样年华的男女，在遥远的边疆，风雨同舟，甘苦与共，孕育了许多美好的爱情故事。

我的老同学、好闺蜜罗蕴华，是个活泼可爱的长沙女孩，很快她就被月老的红线给套住了，对象是同一个医院的军医。

1951 年，一个来自浙江临海的小伙子，闯进了我心里。

他叫王汉云，是我们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，虽然只比我大 5 岁，却是一个“老革命”。他以前在浙江的医学院读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积极响应号召，于 1950 年 2 月参军入疆。单瘦的他，相貌堂堂，个子也高，不光业务学习勤奋，而且多才多艺，吹拉弹唱样样都行，是医院的团支部委员。他恰好与罗蕴华的对象住在一间宿舍。工作与生活中打交道多了，我们很谈得来。

1951 年，我们很自然地相恋了。他性格好，有江浙人特有的柔和，很体贴人。见我冬天手脚总生冻疮，他一个拿手术刀的男人，居然亲自动手给我织了双红色的毛线手套。看到匀称的针法，和分叉的五个小指套，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

1953 年元旦，我们参加了部队组织的集体婚礼，开始了甘苦与共的新生活。大家把艰苦的日子，过出了花好月圆的幸福。现在回头看，觉得那时条件艰苦，但年轻时的我们，以苦为荣，将爱情之花，根植在天山脚下，且深感骄傲。

“解放军万岁！”

婚后不久，汉云接到了命令，前往南疆工作，目的地是喀什的解放军十二医院，我这个内科护士长也随丈夫一起调过去。

1953 年 3 月，天山脚下，依然寒意深重。坐在军用卡车里，我们一路颠簸，向着 1400 多公里外的陌生土地开拔。已经怀有 3 个多月身孕的我，足足颠簸了一个星期，才到达了人生地不熟的喀什。

来到新单位，我们马不停蹄投入工作。当时医院不成规模，也没人熟悉业务管理，一切都待重启炉灶。王汉云去后，开办了一个“医训队”，我则负责教护士们怎么执行医嘱，怎么交接班，怎么照顾病人……

这天，我正在休息，组长领

着一个满面愁容的维吾尔族大叔，急急忙忙向我跑来。原来大叔的妻子生孩子，发作已好几天了，却一直没有生下来。产妇早已痛苦不堪，很可能出现母子性命不保的危险。

当时，少数民族的风俗，不容许男人助产接生，而农场只有我一个女医护人员。麻烦的是，我不是产科医生，但情况不允许我犹豫，我拿了卫生药箱，就跟着大叔奔向他家。

看到产妇的状况，我大吃一惊：这位高龄产妇躺在土炕上，炕上铺着沙。从她身体里流出的血和羊水，已经将沙子染红。我初步检查胎位还是正常的，但产妇已极度衰竭，呻吟也变得微弱。一了解，大叔情急之下，采取了不正确的土法助产手段，还准备让妻子趴到马背上，挥鞭抽马，想让奔跑的马匹把孩子颠下来。听说这些，我倒抽一口凉气，并嘱咐他赶快去给妻子做碗鸡蛋羹，让产妇恢复体力。待产妇面色转红些，我一面安慰她，教她深呼吸，一面伸手帮助她加强宫缩。好一阵紧张的忙碌后，一个漂亮的大胖小子，来到了人世。

当婴儿的啼哭声响起，我仿佛听到了一首最动人的歌曲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喜悦的欢呼，大叔和他的家人们，兴奋得大叫：“谢谢解放军！解放军万岁！”……

这件事，让年轻的我，高兴了很久。



刘布诚（左）和一起进疆的湘女合影。